

Initiation and Foundation of the Chinalization of Marxism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开创与奠基

——以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为研究视角

张远新 / 著

人民出版社

Initiation and Foundation of the Chinalization of Marxism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开创与奠基

——以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为研究视角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与奠基:以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为研究视角/

张远新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01-011792-8

I. ①马… II. ①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国-1935~1948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0188 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与奠基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DE KAICHUANG YU DIANJI

——以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为研究视角

张远新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25

字数:32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1792-8 定价:5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序	田克勤 1
第一章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背景	1
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社会矛盾、艰巨的革命任务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提出了现实要求	1
二、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历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开展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12
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提供了政治和组织保证	18
四、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活动的开展为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奠定了理论根基	26
五、研究中国国情和历史活动的开展为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提供了实际支撑	29
六、共产国际工作方法的改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 提供了宽松的国际环境	35
七、陕甘宁边区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40
第二章 党的领导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43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探索	44

二、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明确提出	56
三、中共其他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认同与回应	73
第三章 党的领导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要性的阐述	79
一、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	80
二、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	88
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原则要在具体的民族环境中来实现	96
四、中国革命的教训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	101
第四章 党的领导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涵的揭示	111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112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化	121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长期化	127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	132
第五章 党的领导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路径的探索	146
一、大力推进学习运动,全面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146
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清国情	171
三、理论联系实际	181
四、将革命经验上升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187
第六章 党的领导群体对毛泽东思想的系统研究和概括	194
一、毛泽东思想的多方面展开和系统总结	194
二、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与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思想的 阐述与宣传	226
三、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	249
第七章 党的领导群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263
一、明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	263
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283
三、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299

四、通过理论创新使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	311
主要参考文献·····	318
后 记·····	322

第一章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社会背景^①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实现重大飞跃的时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有着深刻的内在根据:延安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阶段,国内外形势和社会矛盾异常复杂和尖锐,革命任务异常艰巨;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形成了第一代领导集体及核心,开展了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活动,开展了研究中国国情和历史的活动;共产国际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有了较大的改变;陕甘宁边区已经有了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这一切都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展开和推进提供了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有利的条件。

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社会矛盾、艰巨的革命任务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展提出了现实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延安时期明确提出并取得重大进展,同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进程是密不可分的,是争取中国革命进一步胜利的需要。抗日战争爆

^①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主要是指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即“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同时也包括张闻天、王稼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李维汉等当时党的一些重要领导成员。

发后的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社会矛盾、艰巨的革命任务,迫切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革命。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便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社会存在着两种尖锐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但这两对矛盾随着不同的政治形势,在不同的时期,不断发生着变化。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激烈和尖锐。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曾说:“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①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出现了新的特点。

一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其目的在于蚕食中国领土,灭亡中国,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日本早已定下的阴谋和基本国策。早在 1868 年 3 月 14 日明治天皇即位不久,就公然宣布“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同时开始制定侵略中国的政策和计划,即所谓“大陆政策”。日本田中首相在“东方会议”^②结束不久,便向天皇密奏征服中国、亚洲和世界的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67 页。

② 东方会议是 1927 年日本田中内阁为制定侵略中国的总方针而召开的重要会议。1927 年 4 月,日本田中义一组阁。田中义一是一个恶迹昭彰的大陆扩张主义者,他一贯主张“经营大陆”,认为“大陆扩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唯一方法”。田中内阁上台后更是加速了侵华步伐。6 月 27 日至 7 月 7 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所谓“满蒙政策”。田中在 7 月 7 日的会议上,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明确的侵华方针《对华政策纲领》(以下简称《纲领》)。《纲领》确定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方针,在公开发表的“纲领”中,一开头就公然将中国领土区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妄图把中国东北分割出去,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他宣称:“关于满蒙尤其是东三省”,是一个“在国防上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有“特殊的考虑”的“责任”。

在日本侵华史上,东方会议是一次决定“国策”的重要会议。《对华政策纲领》勾画出田中内阁企图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的“积极政策”的基本轮廓,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攫取整个东北,加快实现大陆政策。“满蒙特殊论”则成为后来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理论根据。东方会议预示着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

略步骤。他说：“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若满蒙权利果真归我所有，则以满蒙为基地，……假借贸易之手段，而征服支那四百余州，然后利用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来攫取整个支那富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洲各国”。同时指出：“掌握满蒙权利，乃是第一大关键也”。田中奏折还指出：“明治大帝遗策的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均已实现”，“第三期是吞并满蒙、征服中国全土”^①。因此，“九一八”事变，是征服“满蒙”的开始，是日本“征服”中国总战略计划的第一步骤。“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很快占领了东北全境，并于1932年3月1日扶持成立了伪“满洲国”，从傀儡政权中攫夺许多权益。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进一步征服亚洲而开辟新的战略基地。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接着向热河进犯，3月4日攻陷承德，4月初，攻下长城各口。4月中旬，日本海军在秦皇岛登陆，天津、北平受到严重威胁。1935年，日本发动了“华北事变”。从此，华北完全被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日本实现了其侵略战略计划的第二个步骤。1936年8月6日，日本政府由首相广田弘毅主持召开了有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参加的所谓“五相会议”，通过了一个《国策基准》文件，其具体目标是：首先占领华北，把东北、内蒙连成一片，以此为基地，进而吞并中国。此后日本政府不断地向华北增兵。1936年9月18日，日军制造了“丰台事件”，1937年7月7日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始了他们的全面吞并中国侵华战略的第三个步骤。

抗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国家日本之间的决死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则谋求生存、谋求解放的战争。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又在不断地向纵深发展。

二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旨在把中国这个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日本单独支配的殖民地社

^① 易显石等：《“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

会,这也加剧了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

从总体上说,英美帝国主义对中日战争的态度,采取了阴险狡猾的两面手法,一方面,标榜“中立”和“不干涉”,而实际上是纵容政策;另一方面,当日本企图独占中国,危及到他们利益时,英、美、法同日本之间的矛盾也就日益突出了。

“九一八”事变前夕,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曾与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达成一项日美秘密谅解:美国允许“不与闻满洲事变”,日本则允许美国在中国“什么事都好商量”。美国完全同意日本占领东北,以便北攻苏联。只有一个附加条件,即日本的军事占领只限于锦州以北,不要再往南妨碍美国的利益。根据此谅解,美国彻底帮助日本占领东北。英国保守党政府是一贯反苏的,它和美国一样,对日本也采取怂恿的态度。英国副外相艾登在下院宣称:“英国现时没有采取特殊步骤以保护满洲利益的必要。”意思是说,日本在东北的军事进攻,它是不干涉的。正是英美采取了所谓“不干涉”政策,才使得日本在短期内占领了整个东北。

然而,日本占领东北,并不是它的最终的目的,它的目的是占领整个中国乃至称霸世界。因而日本于1932年1月占领了锦州,这说明日本并不尊重美英的愿望,即占领东北,而后进攻苏联,而是向中国关内进犯,使美英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特别是美国,愈发感到日本的侵略同自己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利益毫不相容。于是在同年1月7日,美国发表了不承认主义的照会,分致中、日两国政府,指责日本是“扩大军事行动”,同时表示:“我们可能不得不对日本采取断然的积极立场”^①。美国《纽约世界》电文评论指出:日本的侵略战争“其深入程度、不仅威胁中国,且将威胁英俄,国际间之危机绝巨”^②。但它的用意不是反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而是反对日本向南扩张妨碍美国的利益。然而美国的不承认主义,根本没有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1935年,日本加紧了在华北的政治、经济、军事进攻,其结果使华北完全成了日本控

① [日]绪方贞子:《满洲事变及其政策的形成过程》,原书房1981年版,第142页。

② 《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8页。

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日本的侵略扩张,严重地损害了英、美在华北的经济利益,使英、美与日本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935年6月,英、美对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提出指责,同时也加紧了在华北的扩张步伐,其中支持国民党实行币制改革就是重要一步。由此表明,英、美在中日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是以自身利益为轴心而发生变化的,无疑,日本企图独占中国,危及到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利益,激起了它们的极大不满,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凸显出来。

三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存,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两个任务并存,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并形成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以民族斗争为主的复杂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及其政府一方面先是对抗日举棋不定,抱着不抵抗主义,继而又坚持片面的抗战路线;另一方面,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误国政策,坚持“剿共”的反动立场,大势镇压民众抗日活动。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接连在中国制造了“万宝山事件”^①和“中村事件”^②,制造中日摩擦,其侵占东北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但蒋介石曾指示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又命令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即使被日军勒令缴械,占人营房,都可听其自便”。^③正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在“九一八”事变后,短短的4个月零18天的时间里全部沦陷。

① 万宝山事件:1931年4月,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承租长春北郊万宝山村荒甸地近400余垧。随后他擅自转租给朝鲜人,开沟挖渠,引水灌溉,致使中国农民耕地被淹,引起纠纷。7月2日,日本领事馆派日警镇压,中国农民死伤数十人,被捕受刑者十余人。

② 中村事件:日本参谋部的现役大尉中村震太郎,伪装农业专家,于1931年5、6月间潜入吉林洮南地区刺探军事情报,被中国驻军捕杀。日本以此为借口,增兵南满,准备武装侵略中国。

③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京史料整理:《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9册。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驻军十九路军奋起抗战,而国民党政府不仅不调兵增援,反而下令不准海军、空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蒋介石密令各舰队:“准日海军司令来函‘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舰亦不攻击中国军舰,以维友谊’等情,凡我舰队,应守镇静。”由于对日无耻妥协,1933年5月与日签订了《塘沽协定》,确立了日本使华北特殊化的侵略扩张政策。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宣布中国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935年6、7月强迫国民党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并没有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得到满足,反而助长了它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1935年11月,日本侵略者又制造了“华北事变”,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1937年7月7日,又悍然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影响到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及其利益,国民党对日政策有所转变,但它害怕民众的力量,执行片面的抗战路线。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演说中表示:国际主权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以互惠平等为原则。但“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①。1936年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又说:“从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手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做最后之牺牲。”但又说,现“并未到达绝望时期”,“并未达到最后关头”。^②

^① 蒋介石:《对外关系之报告》(1935年11月19日),见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华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8页。

^② 蒋介石:《御侮之限度》(1936年7月13日),见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华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2页。

1936年12月,张学良等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使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有了一个转折。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在对外政策上表示:“如果让步超过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上述三次会议表明国民党对日政策由内战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向着对日抗战的方向转变。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事变的最低限度条件,表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但在日本政府所谓“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解决”的烟幕影响下,国民党政府仍希望能够把卢沟桥事变作为“局部事件”,通过外交途径求得和平解决。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日本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战争指导方案。23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梦想,迫使日本改变了对华政策。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发表了三次《近卫声明》,对国民党政府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集中主要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这种形势下,1938年11月国民党在湖南南岳召开了军事会议,确立了国民党大量军队只作“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的方针,这反映了国民党蒋介石对抗战态度转向消极。国民党统治集团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也于12月公开投降,成立伪中央政府。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宣言:“坚持抗战到底”,就是要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原状。也就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确立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

总体上看,国民党的对日政策总是呈现出不稳定性、摇摆性,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并非出于自愿,完全是日本无止境的疯狂侵略气焰所逼,因此只要有会,它就会改变抗日政策。

国民党政府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政策,对内则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

统一方能御侮”^①的误国政策,加紧法西斯独裁统治。在蒋介石看来,与日本的侵略相比,国内的革命人民才是致命的敌人,必须以主要力量来对付。他认定:“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因此,必须“先清内匪再言抗日”。^②“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呼声,仍然部署对南方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并将英勇抗日的第十九路军调往江西参加“剿共”。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5年,华北事变的发生打破了蒋介石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1936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包括“中、日、满经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等条件在内的“广田三原则”,使蒋介石认识到:“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③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底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此后,国共双方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秘密接触,但蒋介石的本心是反共的,他所说的“中共问题的解决”,实质是要“溶共”,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接受改编,尤其是解除武装,才能“以政治方法来解决”。这当然是共产党不能接受的,因此,蒋介石仍然企图用武力来解决。当1936年秋两广事变^④被解决后,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准备对陕北革命根据地進行新的“会剿”。但同时又继续进行秘密谈判。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南京政府提出包括:军队统一编织、统一指挥,取消工农红军名义;政权统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名义;容纳各派,集中全国人才;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等在内的新的国共谈判的四个条件。1936年12月,蒋介石坐镇

① 蒋介石:《外交为无形之战争》(1931年11月30日),见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华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626页。

② 蒋介石:《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1933年4月6日),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5页。

③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台北1981年版,第69页。

④ 两广事变: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新桂东联合举兵反对蒋介石。蒋介石一面调集军队防御,另一方面收买陈济棠的部属,陈济棠不战自败,7月18日通电下野赴港。蒋解决了广东陈济棠后,使转而对付广西的白崇禧、李宗仁,后来在调停下,双方妥协,南京答应白崇禧、李宗仁提出的“确定抗日计划”等条件。9月中旬,蒋介石、李宗仁在广州会晤,言归于好,两广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率所部开赴陕北“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多次进谏无效并被蒋介石视为“犯上作乱”后,毅然发动“兵谏”。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从中大力斡旋,最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合作抗日的六项条件。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已经是大势所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侵略的绥靖政策以及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的壮大的畏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虽仍声称要“坚持抗战到底”,但却把对付共产党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反动方针。会后设立“防共委员会”,制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各地的反共摩擦活动日趋严重,接连发生了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袭击和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或后方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自1939年冬至1943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旨在削弱以至逐步消灭共产党力量的反共高潮。

同时,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抗日,反而压制人民的抗日要求。对待民众爆发出的抗日热情,蒋介石初始要求国人“镇静忍耐”,最终却是残酷镇压。“九一八”事变后,汇集南京的各地学生3万多人于12月17日举行联合大示威,但遭到大批国民党军警的压制和阻拦。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蒋介石一面加紧剿共,一面采取措施进行压制和取缔许多地方的群众抗日活动。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报》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指为“侮辱天皇,妨害邦交”,要求国民党政府封闭新生周刊社,惩办主编及作者。国民党政府立即将该刊予以查封,并囚禁了主编杜重远。^①6月10日,国民党政府又颁布《申儆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令》,把

^① 《闲话皇帝》一文,是易水(艾寒松)所作,1935年5月4日刊载于《新生周刊》第2卷第12期。该文发表前经国民党有关机关审查过,但国民党政府为迎合日本,除封闭该刊外,还判处杜重远一年两个月的徒刑。国民党上海图书杂志社审查机关的有关人员也被革职。

日本称为“友邦”，宣称：“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华北事变后，为镇压国内进一步高涨的抗日运动，国民政府于1936年11月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并不惜镇压学生爱国的“一二·九”运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内，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加强“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构的活动，在一些地区设立集中营，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

与国民党消极抗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难当头之时，共产党人站在民族、民众的立场上，毅然决然地举起全民族抗日的旗帜。从“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事变”，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把抗战进行到底作为基本政策。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①自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中国领土，中国共产党迅即发表一系列宣言、公告，号召全国人民“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阐明自己的内外政策和政治主张，并系统地提出了抗战的外交路线和方针。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即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②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明确提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③。接着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坚定立场。“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向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③ 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138页。

全国发出紧急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①同日，由毛泽东领衔红军诸将领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同时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②1937年秋，中共召开了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纲领中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否认日本外债，废除日本条约，收回一切日本租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③，制定了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

显然，抗战爆发后，国内外形势、矛盾十分复杂、尖锐，这种情况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多方面的问题，如，如何认识和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如何正确对待处理同友党友军的关系，率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的胜利；如何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人民的力量，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变为人民的胜利；如何进一步把握中国国情，确定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道路和现在革命阶段与将来革命阶段的关系；等等，许许多多关系中华民族命运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都尖锐地提到中国共产党面前，需要做出正确的回答。否则，就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解决这些问题，既不能靠照搬马克思主义现成结论，也不能照搬国际革命组织的指示和外国革命经验、战争经验，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独立地去做艰苦的探索，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对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④这样，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275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③ 沈继英：《卢沟桥事变前后》，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17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